



广东华侨史文库

近代以来亚洲移民与 海洋社会

袁 丁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以来亚洲移民与海洋社会 / 袁丁主编.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8

(《广东华侨史》文库)

ISBN 978-7-218-09469-4

I. ①近… II. ①袁… III. ①移民-亚洲-近现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730.3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5761 号

JIN DAI YI LAI YA ZHOU YI MIN YU HAI YANG SHE HUI

近代以来亚洲移民与海洋社会

袁丁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王俊辉 黄良起

装帧设计: 书窗设计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9469-4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80517

《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朱小丹

副组长: 虞震 招玉芳 唐豪 李锋 吴锐成

章扬定 马建和 李崑 张应龙

《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吴锐成

副主任: 林琳

广东华侨史文库

主编: 张应龙

副主编: 袁丁 张国雄

数据处理方法呢？施坚雅的著作《泰国华人社会：种较好的参考。此书第二章列有“1882—1917年统计表”，^①施氏在制作此表的时候，收集了大量的且有泰方的，不仅有海关的统计资料，而且有外

1882—1893年《厦门领事报告》、1882—1917年三十年报告》（1892—1901、1902—1911、1912—1921），1872—1914年《广州领事报告》，1882—1913年《暹罗领事报告》，1899—1906年《暹罗贸易统计》，1882年《汕头领事报告》，1906/1907—1917/1918年《泰国海关报告》，1916—1923年《泰国统计年鉴》”。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参考华人移民泰国的背景和特点，作出估测：1882—1892年泰国华人入超7.81万人，年均超额0.71万人；1893—1905年入超19.32万人，年均超额1.49万人；1906—1917年入超18.02万人，年均超额1.5万人。约36年间，泰国华人入超45.15万人。^②而据“潮海关统计表”计算，同一时期仅汕头向泰国的净移民即高达41.64万人，考虑到潮人在泰国华人的比例50%多，潮海关的数字明显偏高。而经过比对，我们发现，“潮州志统计表”所引汕头侨务局统计数字更高。误差原因，大概还是将“进出口（出入国）数据”的单位“人次”误为“人数”所致。

最后要强调的是，本文对数据处理方法的批判，绝不是为了否定这些数据的价值，也不是贬低前辈们的辛勤劳动。当然，本文的目的也不是对近代潮汕海外移民的规模重做估测，事实上这也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而是希望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和检讨，提醒大家在处理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在笔者看来，历史的叙事或表达，往往需要建筑在数据的基础上，但对数据的解读却需要方法论的指导，必须清楚“出处”和“概念”，否则极易歪曲历史。

移民与地方神：以“菇神吴三公”分香台中新社的故事为例

罗士杰 台湾大学历史系

一、前言

2011年12月5日，来自故乡台中市新社区的一则报道，彻底地吸引了我的目光。报道内容是说：新社区（改制前为台中县新社乡）的“菇农协会”，在政府机构新社区农会的组织之下，趁着年度“新社花海节”的机会^①，组团前往浙江省庆元县西洋殿——“菇神庙”迎回宋代开始祭祀的“菇神”：吴三公。报道里还指出：现任台中市长还亲自出席这一场盛会并参与“菇神”的绕境活动。^②我觉得有趣，便开始探询那一天菇神在新社绕境的状况与乡民的反应。根据我的口述访问所取得的印象，那天“菇神”的绕境，其实是政府方面组织策划的宗教活动。许多人都是先得到通知说菇神会在那一天经过他们的邻里村落，希望他们准备祭品祭拜，但并没有强制性。总的印象是：作为“新移民”的菇神绕境的热闹程度与乡民的参与状况，还是无法与在新社地区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妈祖信仰：“九庄妈”相提并论。^③

在“亚洲移民”与“海洋社会”的讨论脉络中，“人”的跨国移动与抵达

① 关于新社花海活动，见：周明燕、黄少鹏编辑：《新社花海行乐活99好心情》，台中农委会种苗繁殖场，2010年。

② 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此起新闻。见：今日新闻网、台中市地方新闻：新社区到浙江省迎回菇神，祈保佑菇农赚大钱。记者黄珺琮于台中报道（2011/12/05/21：23）<http://www.nownews.com/2011/12/05/11464-2763760.htm>

③ 关于新社地区“九庄妈”的初步研究，可见：林美容：《台中县新社乡九庄妈的信仰形态》，收入林美容著：《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台北：博扬文化，2008年。

① 《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第67页。

② 这一数据应该来说是比较合理的。1904年，泰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据修正后的数字，是年泰国华人总人口为39.7万人。见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第82页。

“新居地”后进行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或说“嵌入”(embed)当地社会的历史过程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讨论脉络问题。本文所想讨论的问题是:除了“人”的移民外,作为至少“汉人社会”重要的社会组织力量:“地方宗教传统”(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在海外移民与所谓海洋社会建构过程中,又是可以置放在哪一位置去进行讨论呢?复次,自此一个案中,不论是从庆元迎来的菇神吴三公与新社地区固有的“九庄妈”都毫无疑问是属于“地方宗教传统”(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而这些地方神的背后,往往有其支持的“人群组织”。也就是说,透过对这些“地方神”的讨论,我们其实也是在讨论“地方人群”如何在运作“地方政治”。^①透过讨论这一件当代“神明移民”的案例,我们也将可以去展开“地方宗教传统”在“移民社会整合”中扮演角色的讨论。^②为此,笔者先后于2012—2013利用暑假先后前往台中新社、浙江温州、龙泉与庆元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与地方文献的搜集。本文即是近年研究进行之初步的成果。

二、台中新社与浙江庆元

新社区是台湾最重要的香菇产地之一,其产量大约是全台的一半。但其实该地过去的产业结构并非是以香菇为主,而是主要依靠水稻与其他水果如枇杷、葡萄、柑橘的种植为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社处于“新社台地”,属于所谓的河阶地形,也因此一直有缺水灌溉的问题。一直到日据时期,日人利用倒虹吸管的原理,投资建造“白冷圳”将大甲溪水抽至新社台地,方才解决缺乏水利灌溉的问题。^③香菇业是相对很晚才慢慢在新社地区发展起来的“高经济价值”产业。^④而且香菇种植的区域也并非遍及整个新社区,而是集中在1954年因为兴建“清泉岗空军基地”而被强制移民到新社——当地人称为“新村”的地

区。^①换句话说,在新社地区经营香菇业的“菇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20世纪50年代自台中沿海地区的清水与大甲地区迁入沿山新社的“新村人”。

复次,在访谈中所获得的资讯也多指出,以往因为政治上的隔阂,两岸的菇农早先是互相没有接触,但因为海外市场(特别是日本的市场)开拓的关系,因此在很长的时间是处于互相竞争甚至敌对的状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社地区的菇农还常常抱怨大陆香菇的“廉价倾销”对他们生计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之下,新社的菇农协会愿意前往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的浙江庆元去迎回所谓的菇神,因此成为一个饶富兴味的问题。根据笔者最近的一次田野调查,2013年11月,新社的菇农协会又再度组团前往庆元县参拜并迎回第二座菇神。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本为竞争对手的两岸菇农,似乎已经透过“民间信仰”的“菇神”作为媒介进行和解了!

新社菇农所前往的庆元县位于浙江省与福建省交界,在浙江省境内与景宁县与龙泉县接壤;福建省则为紧邻闽北的寿宁县、松溪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根据1996年所出版的《庆元县志》,该县的地理概况,描述如下:

庆元县全境山岭连绵,群峰起伏,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北、东部为洞宫山脉所据,山间盆地相对高度海拔600—800米,斋郎村海拔1210米,是全县最高居民点;主峰百山祖,海拔1875米,为浙江省第二高峰。西南部与中部,是仙霞岭—枫岭余脉,山间盆地相对高度海拔330—600米。这一个地区分布有较多河谷,地势平缓,土质肥沃,灌溉方便,是粮食主要产区,其中黄田、隆官、安南盛产毛竹;屏都、竹口乃“柑橘之乡”;新寮村海拔240米,为全县最低点。^②

庆元县境内多为山脉环绕的丘陵地,主要人群分布的聚落则以河谷地区为主。可耕地并不多,主要的经济行为以山产栽培与采集输出为主。该县虽有“水流两省达三江”的河谷通道地理优势,不过,整体而言,对外交通并不便利,并连带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1949年前全县水不通舟楫,路不通车辆,没有近代工业,人均粮食仅198公斤。广大农村“镰挂上壁就没得吃”……所谓的“温饱问题”,1992

① 这一个“强制移民”计划,官方定名为:“阳明山计划”。见廖隆仁:《新社乡志》,台北大社会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① 关于此面向的讨论,见:罗士杰:《地方神明如何平定叛乱:杨府君与温州地方政治(1830—1867)》,收入:吴松弟、连晓鸣、洪振宇主编:《走入历史的深处:中国东南地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448页。

② 除了对“菇神”移民台湾的研究兴趣外,事实上,笔者以菇神的信仰为引去讨论,除了菇民与菇神之外,浙江省庆元县同时也是清代江南地区实力最雄厚的“民间教派”——“老官斋教”教主姚文宇(1578—1646)的故乡。下文将结合多方资料,包括:清代政府档案、民间宝卷与地方文献,去澄清“老官斋教”特别是在庆元的发展历程。透过对庆元县境内的斋教与菇民的讨论,从这两组看似不同的人群在地方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是如何利用宗教实践去“做”地方政治,也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

③ 廖隆仁:《新社乡志》,台北大社会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许勳坚:《台湾香菇生产与经济调查》,南投县:台湾省政府农林厅,1986年。

年粮食总产量 76327 吨，比 1949 年增长三倍……人均粮食 395 公斤，比 1949 年翻了一番。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①

结合上述地理条件的分析，在庆元县当地谋生相对不易，缺乏对外来民的“拉力”，算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位置。就历代所掌握的户口数而言，从十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庆元人口始终未能突破两万，一直到晚清，庆元的人口才大幅度地增加至近八万人。^② 复就“政权建设”的发展来讨论的话，历代帝国政府多半结合政区发展与户口增长（更准确地说：税基的成长）作为施政的考量。虽说，早在唐乾宁四年（897）就开始有外来移民进入县境定居的记录。但却一直到将近三个世纪后的南宋庆元三年（1197）方才正式建县并纳入帝国管理体系。到了嘉泰元年（1201）才开始建设道路和桥梁，逐步把分散的村落联结起来，方才粗具城郭的雏形。庆元县一直到明末嘉靖廿五年（1546）才完成土城的修筑。^③ 单就“政权建设”来说，至少晚明以前，历代的帝国政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庆元县地区采取相对消极的治理态度。当然这也与庆元的山区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④

三、浙江省庆元的菇民与菇神：

虽说论者指出中国人食用香菇的历史可至少上溯到汉朝，但开始食用人工栽培香菇则据信始自宋代。原庆元县长陈国钧（1947）根据实地考察所著之《菇民研究》一书中对“菇民”人群提出的描述如下：

有人以为菇民像夷民、苗民一样，为一种特殊民族，其所处境地的风俗、文化、教育等一般比较落后。有人以为菇民为一种专业种菇的集团，划然别于普通民众之外，其一切行政措施社会组织亦必差异，其实均非如此。我们所谓“菇民”也者，只是普通民众中以做香菇为业者的一部分人

民而言，其人数包括浙江省庆元县的东乡、北乡、城区约六万余人，占全县人口七成之数……总之，一切在其所属县境与其他非菇民并无二致之处。其所以不同者，不过在每年旧历十月尾到翌年三月前这一段时间以职业所异，必须远离家乡赴闽、赣、粤、皖、桂、湘、黔、各省山地去经营香菇而已。以上各省山地菇业虽盛，惟其做菇者纯系龙泉、景宁、庆元三县菇民，外人不得其法，莫能为之。^①

陈国钧对“菇民”的观察，亦可见于光绪年间地方志对地方经济活动的描述：

（庆元）居乡者以制蕈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川陕云贵无不历，跋涉之苦，甘如饴。焉视所获，十难居五。大抵庆邑之民，多仰食于蕈山。^②

据光绪《庆元县志》的记载，庆元经济基本上就是“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蚕桑之利，尚未有兴”的典型的山区县。主要的经济行为自然也不同于被简单化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有意思的是，庆元县境至少从宋代以来则开始仰赖于县境的香菇产业：“大抵庆邑之民，多仰食于蕈山”。又民国 36 年（1947）庆元县府所编的《庆元县情简编》一书指出，当时：全县计有民六万，约占总人口七成。到了 1953 年，庆元县政府的《菇情调查》一书也指出：

全县 42 个乡有 25 个为菇民区。其中：荷地、杨桥、濠东、岭头、西溪、八炉、东山、石湖、东齐、斋郎、青竹、四山、三坑、竹山，14 个乡菇民最多，占总人口的 74%。举水、落岭、蒙西、合湖、南阳、杨石 6 乡次之，占总人口的 60%。和山、周墩、竹坪、南坑、左溪 5 乡稍少，占总人口的 43%。^③

1993 年，庆元县全县有 60% 为菇农。可说，从宋代开始至今日，庆元县一

①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②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5 页。

③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 页。

④ 另一个可以当做观察庆元山区地方社会发展的指标，是地方的“虎患问题”。根据《光绪庆元县志》，顺治五年十二月、顺治十八年十月、康熙九年、乾隆七年、乾隆廿六年、嘉庆四年、六年、廿四年、道光元年、二年都有老虎入城伤及人畜的记载。乾隆九年的那一次虎患，群虎食人，知县程维伊禱于城隍庙，虎遂遁迹。为了解决“虎患”，地方官还雇用地方猎户捕杀，但效果不彰。道光二年，“群虎复聚，知县乐韶疏告城隍，虎迹遂遁”。从关于虎迹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庆元县还是一个居民与天争地的环境。见：（清）林步瀛、史恩纬修、史恩绪纂：《光绪庆元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66》，上海书店 1993 年版，第 768—770 页。

①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 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 年，第 26 页。

② （清）林步瀛、史恩纬修、史恩绪纂：《光绪庆元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66》，上海书店 1993 年版，第 664—665 页。

③ 见：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4 页。

直享有“中国香菇之乡”美誉。^①一般认为，这与位处浙南山区的地理与气候有关：

（庆元）全境属于亚热带季风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17.4摄氏度，降水量1760毫米，无霜期245天。总的特点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就局部地区而言，东、北部气温较之西南部和中部低，无霜期短，昼夜温差大。这一个气候，最适宜香菇等菌类生长。^②

又，庆元当地所流传的一则“刘祖德娶妻”故事，也鲜明地描绘出菇民出外讨生活的状况：

庆元东区山叠山，山里有菇郎。这个菇郎叫刘祖德。庆元菇民刘祖德前往广东准备做菇。东家陈亦法说：香菇客啊，我想把女儿嫁给你，嫁了再上菇山吧！原来陈亦法一家有好几口人，有个女儿叫爱娥。爱娥正是二八姑娘，长得眉清目秀，端端正正，会飞的鸟见到她要叫三声，会走的山兽见到她要点点头。陈亦法想把她嫁给隔壁村的一个财主家里，可是爱娥刚刚患了一种无药可医的地方病，相传这种病非死不可，只有找人成亲，把毒性传给别人，才有一线生机。陈亦法打定了主意，想害祖德啦。爱娥舍不得害祖德。但一个月后，爱娥就病发了。皮肤又黑又花像蛇皮；身子又肿又浮像木桶。陈爸就把女儿赶出去。外地人祖德只能把爱娥带回庆元菇山搭了菇寮隔离爱娥。然后他留下父亲照顾爱娥，自己出外找药。却都没找到。

爱娥被隔离在菇寮里，天天喊要喝水。祖德回来后，便跟他爸一起用毛竹接水到爱娥的寮里。没想到，爱娥天天喝那个水，病竟然就好了。一天，她对祖德说：祖德哥，我好像没病了！祖德二话不说，劈开草寮拽出爱娥，发现她出落得更美了。祖德高兴地满山乱跳，把茅草屋翻了个天，把毛竹一根一根往山沟里甩……突然，从一根毛竹里爬出一条烂毒蛇！祖德她爸一看就知道是因为喝了毒蛇水，以毒攻毒，爱娥的病才会好。之后，祖德的香菇生意大好，爱娥也有喜了。广东人知道庆元的蛇可以治地方病，纷纷向祖德请教。从此他们又做起了卖蛇的生意。自此，广东人水缸放蛇，庆元农家用毛竹接水的习惯，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贩卖蛇皮也成了庆元人

生财的路子。^③

从上文的故事可以看出，作为“菇郎”的刘祖德带着老父前往广东地区替人种菇为业，结果遇上染了“癩病”（麻风病）的爱娥。原先，爱娥的父亲陈亦法是想透过“过癩”的地方习俗，将爱娥身上的癩病传染给外乡人刘祖德来拯救爱娥的性命。但几经阴错阳差，爱娥通过喝“蛇毒水”的方式治好了“癩病”。不过，不管是“过癩”或是“以毒攻毒”，其实都是流传于广东的治癩方法^②，但不论怎么说，“庆元菇郎”刘祖德在此间其实都是处于“被动者”的角色，亦足见庆元菇民在外营生的辛酸。

刘祖德的故事，也可见于陈国钧前文中所提及的，许多人往往有将“菇民”视做“编户齐民”外之少数民族或是“专业种菇集团”的刻板印象的观察中。而若将菇民这一群“山区流动人口”放置回明清以来山区开发的历史去进行理解的话。很清楚地，在明清帝国的分类体系中，菇民就是明清两代档案中所定义的“棚民”：

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菁，开炉煅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内白）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雍正四年（1726），定例照保甲法一体编查。乾隆二十八年（1763），定各省棚民单身赁垦者，令于原籍州县颁给印票，并有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倘有来历不明，责重保人纠察报究。^③

“棚民”或说“山区流动人口”，基本上是以“开山”为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以山维生的棚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官方视为所谓“编户齐民”体系外的贱民。但在雍正四年（1726）的改革之后，清帝国才正式将“棚民”纳入户籍管理体制中。之后的乾隆朝，还准备针对这一群流动人口采取更积极的治理态度。有意思的是，根据1947年陈国钧的统计，浙南地区的庆元、龙泉、景宁三县，计有十五万菇民。但遍查三地的地方志，却可发现“香菇”甚至不是地方税额的一类。香菇业经营的方式，如陈国钧（1947）的观察，基本上就是菇民与“菇行”间的互动：

^①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59页。

^② 关于麻风病与广东地区“过癩”习俗的研究，可见梁其姿与蒋竹山的研究。

^③ 见：《清史稿》卷120，食货志一。

^① 见：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② 见：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这些菇民足迹所到之处，也就是做菇卖菇的地方。菇民将菇焙干，分成等级，装入布袋，即运到菇行出售。菇民在此地方可说遍地皆是。菇行老板不管是龙、庆、景人还是外地人之组织，一样的是吮吸菇民身上血的臭虫……菇行之组织至为简单，大都老板一人、理账一人、伙夫一人。在每年古历十月半间，菇行老板即筹集一部分资本付山客（菇民）为川资，然后前往择定地点，开设菇行。张挂招牌后，即由菇行老板介绍，像菇行所在地资本家借取大批资金，分赴山客，并备饭食铺盖，以为菇民住宿需用。^①

可见菇民是一种缺乏资本的季节性专业用工（seasonal professional labor），他们显然必须透过“菇行”作为中间人去与市场建立关系。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可以说菇民是具有种菇专业知识并以之为重要副业的农民。菇民的生活状态，可从庆元流传的民谣略见一斑：

隆冬十月空穀仓、做白（米麻）糍离浙江、钻入深山种蕈苦、春返故乡种田忙。^②

在秋末十月，菇民就必须准备前往菇山，准备好干粮后，便进入菇山工作，一直到翌年春天才又回到故乡耕种。对菇民来说季节性的迁移，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常态。陈国钧（1947）对菇民的季节性迁徙有描述如下：

每当冬初黄叶飘零之时，我们常见浙南的龙庆公路上，蜿蜒着一群形容枯槁，鹑衣百结的队伍，他们有的挑着漆黑饭锅，有的挑着状如流苏的破棉絮，有的背上背着沉重包袱，有的手提着褐色的篾篮，老的、幼的、男的、女的，拖着沉重的脚步，这便是菇民们走上菇山途径的一瞥。^③

抵达菇山之后，菇民便会四五人、十余人不等盖起菇寮。菇民出发前都会

先去菇神庙拜拜，祈求菇神赐给好“蕈冬”，寮中要把最好的位置留作“神位”，贴上“吴三公”与“五显神”的灵榜，每天点香礼拜。每个月的十四跟廿九，是菇山定例的“奉师父日”，是日灵榜前会摆起香案，让全寮居民祭拜。此间，菇神庙在菇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自是不可言喻。

菇民所祀奉的菇神基本上有三个体系，依照地域分布的不同：分别为刘基、五显大帝与吴三公等三个系统。透过讨论庆元县志中记载的两则关于吴三公与香菇的“起源传说故事”，或可一窥南宋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1209年去世后被人尊为“菇神”的庆元龙岩人吴三与当地人工栽培香菇的技术发展历程。

很久以前，庆元龙岩有一个后生，兄弟中排行第三，村里人都叫他吴三，后来他教人种香菇有功，大家又尊称他为吴三公。

且说有一次，吴三公去寿宁斜滩担盐，担到斜滩岭时，正好被“五显神”看见。五显神看到这后生两耳垂肩，很有佛性，便有心点化他，随即将手杖抛向崖际，化做一棵桃树，将包袱化做一个小女孩牵在身边，只等吴三公到来。吴三公担着盐，一步一步往上蹬，见一个白发老大妈领着小孙女在路边歇着，那小孙女一直呜呜地哭个不停。白发老大妈见吴三公来到面前，便问：这位兄弟，我孙女口渴，想要吃那崖际上的桃子，你肯帮我摘否？吴三公见那岩际下是个很深的水潭，那桃树又凌空长在岩际上，只在树顶孤单单地结了一个桃子。一不小心跌落岩际，连骨头都没处找呢！正在左右为难时，只听那小女孩越哭越厉害，三公把心一横，放下盐担，顺着树干梗便往上爬，后来桃树断了，吴三公跌落坛底。吴三公觉得一阵迷蒙，睁开眼睛一看，自己正站在一个大岩洞前。只见洞府正堂上有块大匾，匾上写着“五显神”三个大字，匾额下是座神橱，神橱里坐着一位金面红发的大佛爷。原来他就是刚刚路上碰见的老大妈。

“五显神”留三公在洞里学了三年的法，出得洞来，再也不去担盐了，回到龙岩便开始做手艺。说也奇怪，六月天人家编扇，他却做起火笼来，当他把火笼做好，天上果然下起了大雪，村里人个个都来买火笼，冬天下大雪，别人拼命做火笼，他却编起了蒲扇，当他把蒲扇编好，天上当真出了大日头，村里人热得难当，都来买他的蒲扇，大家都说吴三公成仙了。

有一年，温州有一个客商到龙岩“判树”，客商要的是杉树，吴三公却砍了一大片栲树和米榿树，结果客商不要，这些树便在上山任风吹雨打。谁知到了第二年冬天，满山的栲树和米榿树都长出一朵朵小雨伞般的东西。三公采了一兜回家，煮熟一尝，味道很香，便把它取名为香菇。从此，三公每年都上山砍树做菇。有一次，天上飞来一群白鹤，把香菇吃得一颗不剩，吴三公气得发颠

①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 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30页。

②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③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 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32页。

了，举起斧头在菇树上乱砍。谁料第二天，那些被斧头砍过捶过的地方竟长出许多香菇来。从此，三公又得了“砍花法”和“惊菇法”。据说，这都是五显神在暗地里助他呢。从此以后，吴三公把做菇的方法传给了邻里，传给后代。时间久了，邻近的龙泉、景宁两县的百姓也学会了做菇。到了明朝，国师刘伯温把香菇当做贡品献给皇帝，并向皇帝奏本，封三县百姓以做菇维生。^①

在这一个版本的故事中，可以发现：菇神吴三出身担盐工与伐木工，因为受到“五显神”帮忙，^②从而渐次掌握了人工栽培香菇的方法，并推广到庆元邻近的龙泉与景宁两个山区县。另外一方面，虽说当地的居民至今仍津津乐道。不过，却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可以去证明，明朝有皇帝册封庆元、龙泉与景宁三县的百姓以做菇维生的记载。另一则的香菇“起源故事”，则以吴三的太太“香姑”为主线去展开故事：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福建武夷山有家猎户，父女两人相依为命。女儿名叫香姑，是个聪明伶俐，心地善良的姑娘。一天，有个财主入山打猎，见香姑长得如花似玉，就命家丁将她抢去。逼婚那天晚上，香姑趁机用剪刀刺死财主，逃离虎口。财主的管家发觉后，便带了几个家丁随后追捕，香姑逃入山中，在雪地里昏厥过去，管家四处寻找无着，回去就把猎户害死了。时值隆冬，恰好庆元有个青年农民吴三，带着老母出外谋生，路经此处，看见香姑昏倒在雪地，就把她背到附近一座破庙里，解下衣裳盖在香姑身上，连夜守候在她身边。天亮后，香姑苏醒过来，而吴三却因衣单冻昏过去。她看见坐在旁边的老母正在哭泣，就急中生智拔下吴三身上的斧头砍下柴枝给吴三烤火取暖。她一边东砍西刹，一面想到吴三为了救自己冻坏了，无限感激，泪如泉涌，点点滴滴落在斧痕上。后来吴三在香姑的悉心照料下，终被救活，此后他们结成夫妻，恩恩爱爱。次年春天，吴三又路过原地，在破庙前忽闻异香扑鼻，仔细一看，却见去年香姑砍过的那棵枯树上，斧痕正中长出无数菇草，一个个像打开的伞子，散发出袭人的芳香。他便顺手采回一大箩筐，边食边品，不但味道鲜美，且觉得近日患的风寒也很快痊愈了。此后吴三按法去做，还把这经验推广到民间，并

把这菇草命名为“香姑”，以纪念妻子的创造。后人为了尊敬香姑还在菇上加了草头，使香姑变成了“香菇”。^①

上文两则故事，将吴三与“人工栽培”香菇的技术发明归功于“五显神”或是他的夫人相助。在地方文献中，对吴三成神与建立西洋殿菇神庙的过程，提出了一个说法：

西洋村有座大殿，叫“西洋殿”。殿内神橱有一尊佛像，那便是菇民祀奉的菇神：吴三公。吴三公生前到仙界学了制菇法，又把他传给庆、龙、宁三县百姓。三公死后，菇民们便商量起建殿拜祭祖师的事来。先是请阴阳先生来踏地，最早选的殿址是东村的八角岩。不巧那个地方早被马仙占去了，后来只好建在竹山的西洋村。

阴阳先生还留下话，说是大殿要用300株无尾巴的杉树。这可把管事的给难住了。派人四出打听，走了许多州县，看过几百座山头，就是找不到这无尾的杉树。有一回，一个过路的乞丐说：“福建浦城一座山上刚刮过龙风，那山顶全被龙风剪了。”管事们找到那山，用银两买了下来，并领着菇民去那里砍树。砍呀、砍呀，足足砍了一个多月，那树一根根鼓桶般粗，整个山弯都堆满了。可路那么远，这树如何运到西洋村去呢？菇民谁也想不出办法。一天，菇民正在山寮里发呆，突然看到一个老翁挑了一担饭送上山来，那老翁走到木堆前不见了。菇民们过去一看，一头米饭一头菜放在木堆上，只见木堆旁陷下一个大洞，黑黑地深不可测。菇民几天吃不到好饭菜，解开老翁的饭担便大吃起来，不一会，饭吃完了。回头看那木堆已无影无踪。原来，木头早就通过这地道运回西洋村了。现在，西洋殿外的水井中还剩下一段呢，那口井便是当年吴三公运木头时留下的。

木头运到了，菇民请了当地最好的木匠跟石匠来造殿。可西洋这地方四周没村，买不到好菜，工匠们吃得很苦。有一日，一个乞丐赖在工棚里不肯走，管事的见眼前人手不够，便将他留下帮忙做饭，说也奇怪，那乞丐天天抓些刨花放在锅里三捣两捣便成了一满锅猪肉，在清水里撒上几把锯屑，三捣两捣又是一锅虾皮汤。从此，工匠们每天吃上了好饭菜，一座

^①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253—254页。有意思的是，笔者几次前往新社进行采访时，问到新社人对菇神吴三公的认识，往往他们都能说出这一则五显神帮助吴三公的故事。

^② 庆元当地的民间信仰，以五显神、马仙与吴三公信仰等为大宗。关于五显神的研究，详见：Richard von Glahn与蒋竹山的研究。此外，浙江山区长期流传关于刘伯温的故事的现象，也很值得注意。2011年，温州针对刘伯温召开一场学术讨论会。

^① 见：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大殿很快就完工了。大殿造好后，塑佛老司在殿内塑了吴三公的神像。据说，当年五显神曾赐一只黑虎给吴三公巡山管香菇用，因此，吴三公的神像也骑在黑虎的背上，手上还拿一条赶虎的钢鞭呢！^①

上文这一则神话故事其实并未提供太多属于“地方脉络”（local context）的解释。但在田野采集到另一则关于吴三成神建庙的故事，也颇值得讨论：

据传吴三公生前曾在现存西洋殿后面建寮居住，从业道士并传授香菇栽培技术，其间吴三公母亲跟妻子曾在西洋殿上边西庙村茶亭烧茶供过路人饮用。吴三公母亲去世后，吴三公儿子小七也在盖竹因故伤亡（也有传说说他是在此做法时，因意外身亡），小七亡故后，吴三公迁回龙岩村居住，于1209年去世。之后邑人吴标有一次梦见吴三公父子，觉得是吴三公和小七的灵魂显现，所以就发动菇民集资，于宋咸淳元年（1265），选择在吴三公曾经住过地方的下边建起祭祀吴三公的灵显庙，在吴小七伤亡的盖竹村尾建祭祀小七的灵显庙。^②

上文提及的祭祀吴三的灵显庙其实就是今日的西洋殿菇神庙。在第一则故事中，也足以看出庆元与闽北地区蒲城的密切关系。但却并没有如第二则故事中多有提到吴三成神与建庙的过程。关于吴三（1130—1209）何以在死后成为“菇神”这一个问题，是不是就真只是因为菇民感念吴三公这样的简单概括呢？对于这一个问题，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去阐明吴三公身后的灵验故事与菇神庙的连带关系。但若将吴三公的故事放置在史家 Hansen（1991）对南宋时期政府与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思考的话，则又可清楚地发现吴三成神建庙的时间点，其实也正是搭上南宋民间神只在全国政治脉络讨论中崛起的历史现象。^③另一方面，若再比对目前在庆元可以找到的历代吴家的族谱，还可以发现：事实上，至少吴三从他的父亲那一代开始，就已经是庆元当地享有盛名的道士。^④至是，根据在庆元地区可以采集到民间的传说，也多有吴三公除了传授菇术，

还可以行道法、发挥神力的故事。^①因此很可能吴三公家族在庆元地方的形象除了传授所谓的“菇术”之外，事实上还是为人“祈神打鬼，呼风唤雨”的道士家族。我们也由此对吴三公成为菇民的“行业神”与之后菇民建庙的动机能有更多一层次的了解。

有点令人诧异的是，西洋殿菇神庙在1265年建成后，一直到乾隆三年（1738）年方才进行增建，光绪元年（1875）年又进行重建。^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菇神庙跟地方社会的关系，对此根据1947年陈国钧的调查研究指出：

西洋殿光绪元年的重建，乃是由庆元、龙泉、景宁三县的“菇客”所集资重建，故此殿属于三县公产，向由三县菇客推董事一人管理，现庆元之董事，城厢镇后田街吴达帮。^③

由上文可见，至少到了清末，宋以来菇神吴三公的信仰已然扩大成为庆、龙、景三县“菇民”的共同信仰中心，而且可能已经压过其他县份菇民所祀奉的“菇业保护神”：例如五显或是刘基，而成为三县大多数菇民参与的“菇神信仰体系”。关于菇神庙经费的集资方法，或是说背后所牵涉的庞大地方利益分配的问题，亦如下文所示：

菇神庙的经费都来自菇民，其集资方法有两种：一是捐资赞助。所有菇民，一遇造庙，无不慷慨解囊。数百年来，从未衰竭。二是菇山上专设神庙股，一座菇神庙修造历时数年，此期间，为补资金不足，不少菇寮开设菇神庙股，亦即在收成分配时，每十股内设半股至一股。这部分纯收入，不管多少均无偿上缴。一个菇寮，五到六个劳动力，香菇丰收之年，扣除成本，收入香菇十担左右。据1924年资料，其时广州花菇每担白银500元，统菇180元，则神庙股以半股计，得菇半担，价值银元100元以上，集万千菇寮之收入，用于修筑神庙，另有田产，供董事会开支之用。^④

① 相关的故事，见庆元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庆元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吴三公的故里：龙岩村》，庆元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2012年，第99—134页。

② 叶海主编：《菇乡遗韵：庆元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专辑》，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7页。

③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36页。

④ 庆元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庆元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吴三公的故里：龙岩村》，庆元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2012年，第23页。

①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

② 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香菇纵横2011》，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1年，第8页。

③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New Jers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庆元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庆元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吴三公的故里：龙岩村》，庆元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2012年，第8页。

根据相关的记载，一直到了1947年，菇神庙登记有“私田”（应为庙产）一百五十亩左右。^①这在庆元山城而言，有如此的土地持分，菇神庙应该可以称为当地的“大地主”了。菇神庙对浙南菇民的重要性，除了让菇民祭祀吴三公外，其实也还是菇民的“公共空间”：

每年七月份，三县的菇民领袖，常集中在“菇神庙”，对重大事件进行审议与协商。如菇民生命财产遭受不应有侵犯时，做出共同行动，一致对外的决定；如遇有重大诉讼案件，商议最佳诉讼途径和策略，不惜以重金聘请律师，抗争到底，以维护菇民利益。遇有残害菇民利益，泄漏菇民技术，勾结外地官府，残害善良菇民，或者在菇山上劳作时，不守菇帮纪律，胡作非为，抑或强抢豪夺之徒，则在神灵之前给予十分严肃的处置。^②

每年菇民领袖在菇神庙聚会的时间，其实就是菇神庙的戏期，大致落在农历七月十六到十九一共三天。20世纪中的菇神庙会，如下文所描述：

每年阴历七月十六起，是每一年菇民祭祀三公最盛之时，各地菇客男女，群来进香。拜祭甚盛，至十九日连夜演班戏，戏服及一切道具，殿内均齐备，闻系菇客捐助，做戏期间，摊贩云集，间有赌事。^③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菇神庙不仅仅是所谓菇民社群的“公共空间”，事实上，也是该人群最高的权力中心。年度的菇神庙会，基本上，也应该可以理解为类似欧美商界或学界固定召开的“年会”（convention）。由此，与其他行业神类似，吴三公的菇神庙就是三县菇民的“会展中心”（convention center）。透过这一个“年度固定集会”，奉吴三为“菇业保护神”的各地的菇民可以因此同聚一堂，菇民中的领道人物可以聚会商讨菇民利益的问题；劳动阶层的菇民，当然也可以借此机会，进行彼此交流去建立与维持以菇民为中心的“文化权力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④这当然也就可以反映在菇民围

绕于菇神信仰与菇山生活所渐次“层叠”（superscription）出来的“菇民文化”。^①对吴三公神像骑虎握鞭的形象描述，我们也因此可以理解，菇民在山区讨生活，除了种蕈外，往往还必须防兽。他们进入菇山后，还通常会养狗并配有猎枪，且往往练有家传防身术，并往往会在菇神庙会时进行交流。也为了保守制菇的秘密与人身财务的安全，进入菇山工作后，菇民就会改用“菇山话”进行沟通。所谓的“菇山话”的语音、语汇、语法与庆元地区流通的方言大致相同，主要是词意被改变了。^②综上所述，也无怪乎外人会对占庆元人口超过六成的山区季节流动人口的“菇民”产生“特殊民族”或“专业种菇集团”的刻板印象了。

不过，作为唯一一个浙南山区地方社会的“重要人群系统”，菇民的社会组织除了菇神庙、五显大帝与刘伯温信仰外，到了清末还有所谓“同业公所”的成立。对此如1996年版的《庆元县志》所记：

最早出现的菇民组织是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设在福建省建瓯县城内的浙江菇业会馆（又称浙江会馆）。民国初年，庆、龙、景三县菇民联合在闽、赣、皖、桂等省100多县（市）成立的浙江同乡会和菇业公会，以及作为菇业公会中心机构而设在福建省南平的浙江会馆，凡涉及菇民生命、财产受损案件，是时都投诉该会馆，尤其协同当地政府仲裁、调处。今南平市剑浦驿的浙江会馆中保存的“全浙乡祠碑记”，就记有当时经营香菇、乌煤、木排诸事。^③

这些在晚清出现的显然具有“同乡会”与“同业公会”性质的“菇民组织”与原先“菇民行业神”的关系，在上文中并未多提及（或说是刻意地忽略？）。^④但很清楚的是这一个所谓建立在福建建瓯的“浙江菇业会馆”，在职能

① 关于“层叠”（superscription）的概念，可见：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4 (1988), pp. 778-795.

② 关于“层叠”（superscription）的概念，可见：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4 (1988), pp. 778-795.

③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庆元县志（199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对会馆的研究，可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何炳棣的开创性研究，仍多将会馆理解为科举文化下的产物。以此基础，将会馆研究再往前推进的为美籍学者顾德曼（1995）针对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与“地域认同”的研究。见：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此书虽然对“同乡会”与“会馆”的系统，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却完全忽略了宗教因素在同乡组织中的重要团结人群的作用。

①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37页。

② 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2011》，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1年，第14页。

③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37页。

④ 关于文化权力网络的概念，可见：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的设计上是与庆元的菇神庙系统重叠的，甚至于是处于“竞争”的关系。对于这一个“省外”的“菇业公会组织”，当时的庆元县长陈国钧提出的观察如下：

闽省各处虽有菇业工会组织，但其构成分子，为菇行而非菇民，故菇民迄今尚为一散漫无组织的大集团，各自为生，不知团结意义，故偶有重大事端发生，不唯无合法社团为之后盾，甚且菇民与菇民之间，大都幸灾乐祸，自相摧残，似此愚昧行径，可怜亦复可痛，我们亟宜加以开导，再进而指导组织社团，俾资解散。^①

显然这一个“省外”的菇民组织，并未得到“省境”内菇民组织的认同。但这一个以“菇行”建立的“同业公会”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这也可以从1949年前后，对菇行的营业方式与分布状况的叙述中得到了解：

新中国成立前，菇民的香菇是透过“菇行”销售。菇行收取“行佣”（手续费）一般是山客（菇民）2%，水客（买方）5%。此外尚有“吃盘”、“抛盘”、“杀价”、“压级”、“转手谋利”、“利上加利”等收入。1941—1949年，庆元人在福建开设的菇行，计建瓯40间、沙县35间、南平26间、松溪10间、将乐16间、福州15间、洋口30间、政和5间、龙溪7间、三明3间、永安30间、长汀7间、顺昌2间、宁化8间、光泽6间、漳平5间、永泰2间、泰宁3间、邵武8间、共计258间。另还扩及江西、安徽等地。^②

因此，菇民与菇行的互动关系还有许多可以去研究澄清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出身庆元竹坪村的胡睦臣（1910—1967），1947年前后又试图在福州组建浙江菇业公会，一直维持到1949年方才宣告解散。^③

四、菇神吴三公移民台中新社的意义

在学者主要进行讨论的学术脉络中，对于菇神从浙江庆元被迁移到台中新社，多半直接将其理解为典型的“神明分香”行为。^①不过，近来学者针对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也都已经明确指出，移民往往有将原乡的“地方神明”与“仪式系统”搬迁到移居地的现象与历史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神明”与“仪式系统”的迁移也往往与地方社会的人群重新整合过程有密切的关系。^②笔者也因此好奇，这样的过程与模式是否可以应用于2011年与2013年菇神吴三公“移民”新社的故事。与前述“神明分香”研究显然不同的是，菇神吴三公并不是所谓新社菇农“祖籍神”，而是所谓的“行业神”。在这样的状况下，地方社会在地方政治场域中所发挥的“论述力量”，是否因此会有所不同，是此一部分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根据庆元县政府所提供的资料，何以会有菇神吴三公分香台中新社的活动，其实与2011年3月庆元县县委书记陈景飞赴台考察香菇业有直接的关系。同年7月22日，台湾菇农前往庆元拜会，并与庆元县政府副县长阎昌远讨论菇神分香事宜。11月30日，来自台湾总数38人的“请神团”来到庆元，随后于12月2日，将菇神神像迎回台中。^③显然与一般的“请神分香”活动不同的是，菇神的分香行动是透过官方进行的。而且很清楚的是，两岸的地方政府都因为各有各的政治考量，因此都在相当程度上介入此一“神明移民”行为。对此，笔者准备另辟蹊径，将着重讨论显然原先跟新社缺乏渊源的“新移民：菇神吴三公”被“分香”在台湾地方政治场域中所引发的意义与讨论。

一般来说，很典型的“神明分香”行为，在吴三公的个案中却被挂上“庆元迎菇神、菇业旺新社：2011年度开拓新社区菇类品牌行销暨成果发表活动计划”。如前文所述，这一个活动是要与新社地区的年度重要观光活动：“新社花海”进行结合。虽说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但对于并非从事香菇业的新社居民

① 关于民间信仰中神明分香的研究，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可见：Kristofer Schipper 施舟人的早期研究与黄美英著：《台湾妈祖的香火与仪式》，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或林美容编：《台湾民间信仰研究书目》，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7年。

② 郑振满、丁荷生等人近年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移民至东南亚地区的研究。见：郑振满：《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近代史研究》，2010第二期。郑振满：《莆田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石庭黄氏家族的例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十卷第二期，（2012年10月），第89—128页。地方神明与社会整合的问题，见：Wang Shih-Ch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 Chinese Town” in Arthur Wolf edit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71-92.

③ 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香菇纵横2011》，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1年，第16—17页。

① 陈国钧：《菇民研究》（1947），收入庆元县香菇研究会编印：《香菇纵横2012》，庆元县香菇研究会，2012年，第39页。

②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庆元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③ 胡睦臣（1911—1967），浙江省庆元县竹坪村（今属左溪镇）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曾任国民党国防部法制处少将专员、国防部二厅少将部副。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福建创办《南方日报》，并为首在福州筹建闽浙赣香菇公会联合会，被推选为主席。1949年去台湾，1967年逝于台北，墓葬台北郊区阳明山麓。转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2609398.htm?fromTaglist>

来说,迎来菇神的活动,并非是属于当地宗教生活的重要环节。菇神迎到新社后,地方上其实并没有一座为此“新神”所建的庙。因此经过“新社菇农协会”的讨论,就先将“菇神”迎至在邻近新社重要香菇产地新五村主祀天上圣母“中兴岭圣普宫”,并于12月5日举行绕境活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圣普宫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地方公庙”,而是由四名来自台中市区家庭主妇,因缘际会下,来到新社山区建立此庙。此庙的建造故事,即如下文所示:

《中国时报》2007年12月5日4位奇女子筹款建庙20年 林淳华/新社报道:4个平凡女人,有的出家,有的相夫教子,就只因对妈祖的共同信仰而结合,一起帮妈祖盖庙。她们从30岁到60多岁,从小姐变成阿嬷了,都蜗居在新社山区盖庙,20多年来只做建庙这件事,共同谱写一页山中传奇。出家的传显原本住在台北,主持陈刘秀凤、颜贞子、林金枝则是住在台中市的家庭主妇,各有家庭,20多年前,4人因缘际会凑在一起盖庙。在妈祖的指示下,她们来到新社协成村的柑橘园,在山中开垦荒地,耗尽青春在山中修行,兴建一间富丽堂皇仿古的庙宇,20多年来,胼手胝足,汇聚众人的力量,兴建大庙,过人的毅力让人折服。妈祖圣普宫,尚未完工,圣普宫盖了20多年,都没有完工,因为资金不足,4名女人力量有限,办公室内张贴会员芳名录,希望有1千名会员,每人捐出2万元,就可以完成她们一生的愿望了。颜贞子说,盖庙没有那么简单,一生背负建庙的使命,年岁渐长,身体走下坡,感觉愈来愈无力。妈祖信徒以海线为多,4人也不知道当初妈祖为何选上此处,这里是产业道路最高点,位在新社庄园的上方,可以鸟瞰新社聚落。

住了山区20多年,她们发现空气好,安静,但是常常要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因为力量有限,有多少钱才盖多少,圣普宫还可以看到版模刚拆走的香客房,大门只见雏形,后殿的天花板也没有油漆,只有大殿最富丽堂皇。4人从小姐已成阿嬷,20多年的建庙过程,4名女人也见证了台湾庙宇工程的转变,刚开始建庙之初,龙柱都是台湾大溪师傅巧手雕刻,3米以上的供桌,是当年大雪山伐木最后一批标售的肖楠。最近的工程则多是大陆进口的龙柱,被偷的香炉也从大陆进口石头香炉,才不会被偷。如今4名在山中建庙的女人都已经60多岁了,往返台中住家和圣普宫之间,养育的儿女也都已经长大了,她们从小姐变成阿嬷了,兴建庙宇的壮志仍未完成。她们坚信,妈祖会保佑她们完成使命的,虽然是平凡的女人,但是她

们毅力让人折服,凭着坚毅的信仰,会继续筹措建庙经费,写下这页山中传奇。^①

根据笔者最近的田野调查,已经过了20多年,但这座庙到目前也还尚未完工。与所谓的“地方公庙”性质不同,圣普宫乃是私人起建,并以会员制募集建庙基金的“私人坛庙”。此间所谓的“地方公庙”,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社区“共有”与“共同支持”的庙,因此取用的资源来自所位处的社区。至于台湾亦多有“私人坛”,顾名思义是由私人所建立,与所处社区的关系,是可以有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②2011年,笔者前往该庙进行田野调查,曾对该庙管事主持有过访谈。当时问及,何以菇神会迎来圣普宫,主持答道那是因为参与这一次到庆元迎回菇神的主要组织人多为该庙的会员。之后,笔者转往采访“迎菇神”实际组织者林明顺先生(同时在新社开设菇神特色餐厅),并询及绕境当天的神明出巡仪仗与人员的来源。根据林先生的回应,当天负责绕境的工作人员与绕境仪仗,也并非是属于圣普宫的仪式系统,而是从另一个与“菇农协会”友好的“山顶村”的公庙所邀请而来。^③这也等于说,已然分香到新社的菇神吴三公,其实还无法进入原先的地方公庙仪式系统中。也因此,虽说在庆元是地方政治场域中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菇神吴三公,就算到了台湾产菇胜地新社,也还只能先棲身在缺乏地方社区支持基础的私人坛“圣普宫”中。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为,私人坛如“圣普宫”,又是如何在当地建立基础。何以会有四位女性自愿从台中市区上山替妈祖建庙,此间又有何种故事?或说背后有何“地方脉络”去支撑这座庙。初步根据田野访谈的经验,笔者推断这可能与自宋以来流传于东南沿海的“吃斋人”传统与自明末以来盛行于浙南、闽北地区的“老官斋教”传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限于题旨与篇幅,在此先不展开讨论。^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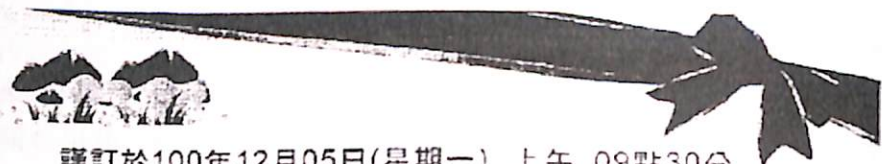
虽说2011年迎回的菇神被暂放在“圣普宫”中,但2013年笔者又再度前

① 见《中国时报》2007年12月5日有关报道。

② 地方公庙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可见林玮媛:《台湾庙宇的发展:从一个地方庄庙的神明信仰、企业化经营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影响谈起》,《台大考古人类学学刊》,2005年2月,第57—92页。

③ 2011年5月24日,林明顺先生访谈记录。

④ 关于“老官斋教”的早期研究,见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公司,第840—853页。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第343页。又关于“老官斋教”与浙南、闽北的关系,关于斋教团体在浙江地方社会活动的相关讨论,见罗士杰:《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1850—18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2012年3月,第159—202页。



謹訂於100年12月05日(星期一)上午 09點30分
假 新社花海主舞台區，辦理100年度開拓新社區菇類
品牌行銷暨成果發表「慶元迎菇神、菇業旺新社」
農特產展售活動。

恭請 **蒞臨指導**

| | |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主任委員 | 陳武雄 |
| 臺中市政府 | 市長 | 胡志強 |
|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局長 | 蔡精強 |
|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 | 理事長 | 劉福榮 |
|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 | 常務監事 | 孫國和 |
|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 | 總幹事 | 羅文正 |

敬邀

迎菇神記者會

時間：12月03日 11:00
地點：桃園機場 第二航廈1019簡報室

| | |
|-------------|---------|
| 10:30~11:00 | 班機抵達 入境 |
| 11:00~11:10 | 迎菇神 慶豐收 |
| 11:10~11:20 | 迎神舞 |
| 11:20~11:30 | 貴賓致詞 |
| 11:30~11:40 | 媒體採訪 |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主辦單位：新社區農會



菇產業行銷展售會

時間：12月05日 10:30~15:00
地點：新社花海 主舞台區

| | |
|-------------|------------|
| 09:30~10:00 | 菇類產品試吃品嚐 |
| 10:00~10:30 | 菇類趣味活動 |
| 10:30~11:00 | 音樂演奏 |
| 11:00~11:20 | 菇神駐駕慶典活動 |
| 11:20~11:30 | 迎神舞等團 |
| 11:30~11:45 | 貴賓致詞★ |
| 11:45~11:55 | 花海起飛、綠境新豐收 |
| 11:55~13:30 | 自由客 |
| 13:30~14:30 | 活力樂隊 |
| 14:30~15:30 | 菇類趣味活動 |
| 15:30~16:30 | 菇類產品試吃品嚐 |

社地方的菇农将会在最近与新五村的居民讨论，对“菇神”的供奉方式。目前也已出现两种可能的选项：首先为菇农捐资替“吴三公”在新社盖庙；第二种可能则是准备加入现有的社区型的“地方公庙”的仪式系统。等于说就是将吴三公加入地方既有的宫庙祀奉的神灵体系中。这样的转换，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当地菇农与社区已经渐次地接受了“吴三公”这位跟他们原本并无直接渊源的神灵。但引人好奇的是，何以会有这样的改变？几位受访人都不假思索地说：喔！那是因为最近三年香菇的平均价格上涨了至少三成。然后大家归功于这可能是由于吴三公“移民”到台湾所带来效益，也因此村庙系统会愿意接纳这一位“外来神明”，并与庙中的主神：天上圣母与其他王爷共享村子里的香火。

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其实跟近年来新社当地的人群组成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根据笔者的田野访谈，负责组织迎菇神活动的林明顺先生，其实并非世居新社，而是本来在南投县竹山镇种植木耳起家。后来在十多年前，才辗转有机会来到新社开创香菇相关的产业。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林先生迎菇神后，必须将菇神暂厝在地方的私人庙宇而非地方公庙。有意思的是，到了最近几年香菇价格上扬，更多当地“菇农”愿意支持“菇神吴三公”的祭祀，从而可以加入当地的神灵体系中。从人群的角度来说，虽说尚待菇农与当地的信徒组织进行讨论，但无疑分布在新社各地的菇农由此或有机会都会加入新五村的“紫明宫”的仪式体系中。当然也有可能，当地的菇农希望能如庆元一般，建立起一座具有统合当地菇农的“菇神庙”。虽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不过很清楚的是：原本来自浙江庆元缺乏与新社地方脉络联结的菇神信仰，因为信仰人群转移的关系，最终都会渐次“脱离”其原乡的脉络，而被新居地的社区“地方化”(localized)，从而进入当地居民的生活经验中。菇神吴三公分香到台中新社的故事，或许可以替这样的发展下一个重要的注脚。

往当地进行田野访谈，得知当地的菇农协会准备再次前往庆元迎回菇神。到了将菇神吴三公迎回新社后，笔者再次前往当地进行田野调查与访谈，得知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菇神的供奉位置已经由私人坛的“圣普宫”转往新社香菇的重要集散地：新五村的地方公庙“紫明宫”。田野的访谈也明确地指出，新